

# 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

李 并 成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提 要:**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批地理方面的书卷, 依其内容可分为古地志、古行记和地理杂文书 3 大类, 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非常珍贵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主题词:** 敦煌遗书 地理书卷 学术价值

1900年, 敦煌莫高窟中珍藏的 4 万余卷六朝至宋初的写本卷子得以面世, 其规模之宏, 方面之博, 内容之实震惊了全世界。敦煌遗书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仅就地理方面来说, 其中就包罗了一批古地志、古行记之类的写卷, 也包罗了大量较零散的或间接的反映地理内容的文书。这批地理书卷除《大唐西域记》等少数几种外, 绝大部分为我们以前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它们既为历代官私目录所不著录, 也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 自敦煌石室封闭近千年来我国历代学者对其一无所知。它们的面世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从而也为地理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珍视。

## 一、敦煌遗书中的地理书卷

本文论及的地理书卷目前尚限于已公布发表的部分, 包括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以S.冠头编号)、巴黎国家图书馆(以P.冠头编号)、北京图书馆(以B.冠头编号)和部分散见(以“散”等冠头编号)的卷帙。

敦煌地理文书从内容上看可分下列几类:

### (一) 古地志写卷

含全国性地志和西北部分地区地志两部分。

1. 全国性地志(存 3 卷) 《贞元十道录》(P.2522), 唐代著名舆地学家贾耽撰, 为我国中古时代一部重要的舆地著作。原书宋代以后亡佚, 幸于敦煌遗书中复得。但可惜的是残缺过多, 仅余 16 行, 记剑南道 12 州, 即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 载州名及所管各县县名、等第、位置、土贡等。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唐宣宗时学士韦澳撰。《新唐书·韦澳传》载,帝以是书“敕戒州事,人人惊服”。可见其编纂之佳。原书亦宋代亡佚。本卷残存205行,叙河东道州府8,即晋、太原、代、云、朔、岚、蔚、潞,记建置沿革、事迹、郡望地名、山水、物产,有些州后附处分语,指出其军事上的形胜险阻。

《敦煌市博物馆藏地志残卷》(敦博58号),纂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存160行,记陇右、河东、关内、淮南、岭南5道所辖州郡及领县的等第、位置、土贡、州县公廨本钱、县辖乡数以及部分县的易名。

2. 西北部分地区残地志(存11卷) 多为唐、五代时期沙州(敦煌)残志。《沙州图经卷第一》(S.2593背),仅存6行,记沙州的地势、土质、草木等内容。

《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首尾俱残,存513行,为敦煌地志文书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者,纂于盛唐时期。卷中详细缕述沙州所辖敦煌县的河流、渠道、壕塹、泉泽、堰堤、碱卤、盐池、湖泊、驿站、州学、县学、医学、庙坛、殿堂、怪异、祥瑞、土河、故城址、古长城、歌谣等内容。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P.2695),存78行,与上述P.2005之399—513行内容完全相同。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五》(P.5034),存132行,记沙州所辖寿昌县的庙坛、县学、山川、湖泽、渠道、古关隘、城堡、道路等内容,其后还专述寿昌县所辖播仙镇的地理状况。

《沙州城土境》(P.2691背),卷首残,属地理内容者存23行,纂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记沙州去两京里程、四至、泉湖、盐池、坟冢、故城、寺庙、山脉、渠道、名胜等。

《沙州图经》(S.0788背),残存16行,记沙州敦煌、寿昌二县地理事物,内容多与P.2005、P.5034等同,唯记寿昌县公廨本钱不见于P.2005等卷。

《寿昌县地境》(散1700),首尾完整,纂于五代后晋时期,记寿昌县去州里程、公廨本钱、户数、乡数、沿革、寺、镇、戍、烽、栅、堡、山川、渠道、涧、关、亭、城址等和古楼兰地区的屯城、鄯善城等7所城址以及蒲昌海、播仙镇、沮末河等内容。

《沙州伊州地志》(S.0367),残存87行,纂于五代后唐光启元年(885年),前半部分记寿昌县及所辖古楼兰地区地理,内容与散1700等互有异同;后半部分记伊州(今哈密)及所领伊吾、纳职、柔远3县和伊吾军的各项地理事物。

《西州图经》(P.2009),残存56行,纂于唐代中期,记西州(今吐鲁番)通往各地11条道路、2所窟院和1所塔。

《敦煌录》(S.5448),首尾全,共80行,约纂于唐末至五代之初,记敦煌境内古城址、长城、山河、寺庙、莫高窟等内容。

《始平县地志》(S.6014),仅存7行,纂于唐高宗时期,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县)道里、祥瑞等内容。

## (二) 古行记写卷

含往西域行记、往五台山行记和全国性游记3部分。

1. 往西域行记(存8卷) 其中《大唐西域记》4卷,即序言及卷一(P.2700),存

13行;卷一(S.2659),存303行;卷二(P.3814),存180行;卷三(S.0958),存16行。敦煌本《大唐西域记》是目前所见该书最古的本子,约写于成书后的100年左右,较传世的宋本、金本和日本藏本都要早,且优点很突出,季羨林、章巽、吕澄曾利用敦煌本校出传世诸本不妥之处百余条。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残存229行,原书久逸,幸而敦煌复出,记新罗僧人慧超赴印度半岛沿途各国各地宗教、疆域、兵力、民俗、物产、服饰、言音等情况。

《西天路竟》(S.0383),首尾完整,共21行。黄盛璋考得该卷为北宋乾德四年(966年)诏遣僧行勤等157人赴西域、印度求经沿程的记述<sup>[2]</sup>,首起东京开封,尾至南天竺国宝陀洛山及游尼若水。

于闐文《使河西记》,原卷为俄人钢和泰(Stel-Holstein)所藏,共73行,英人贝利(H.W.Bailey)将其整理成4部分,前3部分是于闐使臣所写有关沙州地理、政治部旅以及他们在沙州朝礼、施舍、祈愿等佛事活动向于闐方面的汇报,其中记载了自于闐到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朔方等地的行程;第4部分为韵体抒情诗。黄盛璋先生对该卷有专门研究<sup>[3]</sup>。

《印度行记》(P.3926),仅存3行,提及“至迦湿弥罗国”、“至东印度”等语。

2. 往五台山行记(存5卷) 五台山传说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佛教流传国家中影响很大,不仅中国各地僧侣前往礼佛者甚多,就连印度僧人亦以朝拜是山为最大心愿。因而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写卷。

《五台山行记》(P.3973),残存7行,记沙州某僧人往返五台山行程。

《五台山行记》(P.4648),残存34行,记某僧人自怀州、经泽州、潞府至太原城一路情况。依本卷文意该僧人当是由晋南前往五台山的。卷中对沿程州郡、驿站、关隘、寺院等记载较详。

《五台山行记》(S.0397),残存31行,约写于五代后唐时期,记某僧人自北京(太原),经忻州、定襄至五台山情形。

《印度普化大师游五台山日记》(P.3931),首尾全,共46行,记该大师巡礼五台山各寺情况。

《五台山志》(P.2977),共12行,记五台山的名称来由、中台、东台状况。

3. 全国性游记(存1卷) 《诸山圣迹游记》(S.0529),尾残,存151行,首起序言,尾至西岳华山,为某僧人游历各州郡寺院、名山圣迹的记录。该僧人足迹北达幽燕,南抵广州,东至海滨,西徂华山,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似这样规模宏大的全国性游记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中国地理学史、文学史上亦是罕见的佳作。

### (三) 地理杂文书

含水利文书、敦煌名胜古迹文书2部分。

1. 水利文书(存2卷) 《水部式》(P.2507),残存144行,撰于唐开元年间,为目前见于记载的由中央政府作为法律正式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内容包括对农田水利、碾硐设置、内河航运、海运、渔业以及运河船闸、桥梁、城市水道等方面的管理法规。

《沙州敦煌地方农田灌水细则》(P.3560背),残存101行,制订于唐代前期,为敦煌

地方政府以《水部式》为指导原则,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传统习惯所订的灌溉用水细则。卷中记敦煌水渠80条,渠口斗门5处,甚为详备。

2. 敦煌名胜古迹写卷(存2卷,有7个卷号) 《莫高窟记》(P.3720背),首尾全,存13行,唐咸通六年(865年)撰,记莫高窟的开创及其以后不断建造的史实。

《敦煌古迹二十咏》(S.6167、P.2690、P.2748、P.2983、P.3870、P.3929),约作于唐代中期,为五言古诗20首,分别咏颂敦煌的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阳关等20处名胜古迹。

敦煌遗书中直接与地理相关的文书大约以上诸种。此外尚有大量的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典租契约、名族志、氏族谱、姓氏录、古事记、渠人转帖、行人转帖、社司转帖、食物帐、杂物帐、会计帐、官私文牒、牧籍,以及诗词歌赋、佛经等亦蕴含许多珍贵的地理学资料,但散见,就不一一细述了。

## 二、敦煌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地理书卷是敦煌遗书中最珍贵的部分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一) 对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研究的价值

几部唐代全国性地志所载各道顺序、统州县数、统乡数、州县等级等内容,与《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新旧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旧唐志》)、《括地志》等典籍多有异同,对于校勘补苴史籍,搞清当时一些州县废置、归属的情形大有裨益。如P.2522存剑南道12州,而《通典》遗曲真霸协4州,《元和志》遗保霸2州,《新唐志》遗协翼2州,均不及P.2522齐备。各州管县诸书亦多参差不合,比较言之仍以P.2522所记齐全且正确<sup>[1]</sup>。P.2511、敦博58这方面优点亦很突出。如马世长考出,敦博58号卷所载127州的乡数中可补《元和志》之阙者有43州,可以互校的有80州;卷中记县领乡数者达576县,而《元和志》有此项记载者仅47县,不足本卷1/10;本卷所记各州府县等第亦较他书完备可靠<sup>[4]</sup>。

S.0529则记载了全国许多节镇统州县数,亦可证史、补史及纠史之误。如记幽州管9州70余县,定州管3州16县,镇州管4州46县,邢州管3州16县,邺都管7州50余县,沧州管4州20县。定、镇、邢管州与《旧唐志》、《新唐书·方镇年表》同,幽、邺、沧则相去甚远。这说明五代时其统区有变更而史籍缺载。此卷又记五代时吴统28州,吴越统12州,可纠《新五代史·职方考》的误载。

黄盛璋指出,《使河西记》提供了两项重要的历史政治地理资料:一是归义军节度在张议潮时领11州,至曹氏时实管仅瓜沙2州6镇,后增为8镇,镇名无确载,向达仅考出其中3镇,而该卷文书列6镇8镇之名赫然俱在,并皆为交通要镇;二是归义军节度使及所管11州出于勅封,实仅名义而已,如伊、西、庭3州实属西州回鹘所辖,非归义军管及,该文书表明了此种名义关系<sup>[3]</sup>。

P.2511载“处分语”,类似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于每省(布政使司)每府卷首的总序,概括本地区军事地理形势及其在历史上的战略位置和作用,着重分析山川险要和攻

守利弊。这种带有经世致用目的的论述为后代许多志书所仿,对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颇有意义。如潞州(上党郡)处分语:“壶关势险燕赵,屏卫洛京,表里山河之固,实为朝廷重倚”。等等。

### (二) 对于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价值

P.2522、敦博58列各州郡土贡,P.2511载物产,S.0529更是详记各州特产、物产及其经济方面的优势。如幽州“封疆沃壤,土地平广膏腴,地产绦罗,偏丰梨粟”;邺都魏府“土出绦罗,多丰繁,平原险陆,左右山川,商贾填便,不殊镇府也”;“大凡河北道六节二十四州,南北二千里,东西一千里,西皆崇山,北是外界,南有大河、东临海溟,桑麻遮日,柳槐交荫,原野膏腴,关闹好邑”等。正史中有关唐代诸州物产土贡的记载主要见于《唐六典》、《通典》、《元和志》和《新唐志》,这些史籍仅简单地列出各州郡物产土贡的种类,所列虽与S.0529略同,但不及S.0529说很确切生动,并且缺乏相关分析。S.0529则不仅列其种类,而且将物产与当地地理环境特点联系起来,与商业和城镇的发展联系起来论述,其价值自然超迈他书,从中也体现了作者某些朴素的经济地理观念。

又敦博58、散1700、S.0367记载了唐代各州县公廩本钱(各正史均失载),这为研究唐代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使我们看到公廩本钱这种官方经营的高利贷在唐代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通过对各地公廩本钱征收数量的对比研究又可使我们得识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以及经济地理分区的某些片断。

敦煌遗书的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当时全国各类经济区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探讨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总的经济地理格局颇有补益。

### (三) 对于历史民俗地理研究的价值

P.2511专列“人俗”一项,记各州风俗民情。如代州雁门郡“其风俗与太原略同。然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馥则剽劫,丰饱则柔从,乐报怨仇,号为佳谁掣,不憚攻杀,所谓枉金革死而不厌者也。纵有编户,亦杂戎风。比于他邦,实为难理。”摒弃那些污蔑少数民族部落的语言,其地民族杂居、民风剽悍刚烈的情形跃然纸上。S.0529亦有民俗民风的记载。如幽州“俗尚贞□,人少勇烈”;定州“好客尚宾,人□礼乐”;荆南“街廊严净,坊市清虚,马猪犬羊,并居城外”等,亦很珍贵。

### (四) 对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价值

敦煌本《大唐西域记》、《使河西记》、P.3532、S.0383、P.3926等,文字简炼生动,内容充实可靠,所述路程条理清晰,方位准确,大抵皆实地所经,系第一手资料。依此不仅可复原出自长安或开封,穿越河西走廊、西域直至南印度的交通路线,补正史之不足,而且使我们得识沿程许少地区和国家的宗教、疆域、城镇、兵力、物产、民俗、服饰、语言等方面状况,丰富而生动。如黄盛璋据《使河西记》考出,该卷之沙州前一站为楼兰,解决了玄奘所经之纳缚波故国旧来不明的位置问题,也为楼兰、鄯善国都的迁移提供了考察依据;且未往西直到和阗,古道多在今路之北,因沙漠扩大城镇被埋,道路南移,具体时间取决于这些古城利用下限,如媲摩,宋初犹为通路所经,与唐初玄奘时同,至少宋初仍被利用;沙州至朔方段道路,本卷第一次提供了一份详细且完整的全线路线记录,并且记到州县以下程站,

多为汉文文书所不载<sup>〔3〕</sup>。

有关五台山行记的几个写卷揭示了由沙州至五台山和由晋南至五台山的几条路线,P.3973还使我们得知唐末五代沙州到五台山除取道瓜、肃、甘、凉、灵、邈、京兆、东京,自晋南以赴外,还有一条北道,即从灵州北折,经丰、胜、朔、代、忻抵五台山。敦煌许多十二时令文书记载胜、丰一带节气,皆因僧人经常往来此处之故。沙州通五台山的道路实际上即是经过沙州和河西走廊,连接印度和五台山两大佛教中心的道路,从而可以窥见当时中印宗教、文化频繁交流的一个侧面。许多学者指出敦煌地区的佛教即是印度佛教与内地佛教融合的产物。

S.0529则为罕见的全国性游记,其所涉区域之广阔,所述路线之翔实,所记事物之生动,无愧为我国古游记中难得的珍品,对于研究唐五代时期全国交通地理的重理贡献自不待言。

一些古图经、古地志写卷还备载通过本地区的驿站和交通道路状况。P.2005专列“十九所驿”一节,详细记述沙州所辖诸驿位置及设置情况。P.5034则记述了古楼兰地区通往各处的6条道路,P.2009记述了西州通往各地的11条道路;详载各道走向、里程、途中有无水草井泉、井泉水质、路况是否险峻、可否通行车马等情况。这些材料较正史《地理志》、《外夷传》等更为具体生动,不仅对于研究丝路古道弥足珍贵,而且还为我们探讨沿程自然环境的今古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 (五) 对于古地考证及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价值

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古代城址不少,有的早已深陷沙漠之中阒然无闻,有的则在史籍中记载混乱错谬迭出,敦煌地理书卷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资料。如唐瓜州城,《明一统志》、《甘肃通志》皆云位肃州西,《大清一统志》则云位安西州东,《重修肃州新志》、《安西采访录》又云位安西县西南,今天许多学者仍各执其见。笔者则根据P.2005“苦水”条有关记载和其他一些文献、考古资料,并实地踏勘,考出唐代的苦水正是今安西县南的黄水沟,而P.2005云苦水南十余里的瓜州城正是今安西县的锁阳城遗址<sup>〔5〕</sup>,从而也证实了向达《两关杂考》、闫文儒《河西考古杂记》所载“私意以为锁阳城或者就是瓜州城”的推测。

此外,敦煌文书对汉敦煌郡城、古阿仓城、效谷城、敦煌境内古长城、古塞城、阳关、玉门关、寿昌城、瓜州境内常乐城、悬泉城、古楼兰地区石城、屯城、新境、葡萄城、萨毗城、鄯善城、故屯城、播仙镇以及伊州境内一些故城址的记载亦翔实可靠,较之正史有关内容要丰富确切得多,这对于考证这些故城址位置,进而探讨西北干旱区古代城市布局及城市体系的形成演变规律极有助益。

#### (六) 对于古代灌溉制度及农田水利研究的价值

《水部式》残卷反映了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集大成的一个时代,在水利普遍发展基础上之水利管理方面的成就;P.3560背又显示了唐代以《水部式》为指导还制订有地方性的灌水细则,其水利事业的长足进步由是可观。笔者还根据P.2005及其他百余种文书考出,有唐代敦煌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条,它们有机地构成完整的灌溉网系,滋养着绿洲的土地,哺育了举世文明的敦煌文化。敦煌虽处边郡,当时人口也仅万余,然而水利事业竟有如此之壮举,其工程建设的规模之宏大,渠系堰坝的配套之完备,管

水配水的制度之严密,实在是令人赞叹的<sup>〔6〕</sup>。

### (七) 对于历史自然地理及环境变迁研究的价值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对地理景物记实性的描述,据之可复原该地区千余年前的自然地理面貌,并进而研究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探讨在人类活动影响下自然景观的演变规律,为今天的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服务。

P.2005开篇首叙甘泉水(今党河)源头状况,言其“美草,……蔽亏日月”,“山多野马,……狼虫豹窟穴”等。而在今日这里的植被状况已远不及唐时茂密,野马、狼、豹等更为罕见。该卷又详记沙州境内各主要盐池、泉泽状况,云其“州界辽阔,沙碛至多,咸鹵、盐泽约余大半”。如仅州北的大井泽范围即达“东西卅里,南北廿里”。而今天这些泉泽大多早已干涸,有的则成为盐渍草甸。古今水系状况的这种巨大差异,考其原因当主要在于古时农田面积不大,灌溉需水尚少,因而流注泉泽的水量较多,且绿洲地下水位较高,故泉沼广布。此外是否还有气候变迁的影响,很值得研究。

P.5034、散1700、S.0367等对蒲昌海(今罗布泊)有详细记载,云海水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阾、于阾在南山下,其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塔里木河上中游)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将罗布泊水系的源流分合、湖泊位置、范围等记载得准确有据,对于研究历史上罗布泊及塔里木河系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 (八) 对于历史地名研究的价值

敦煌地理书卷中出现的古山名、河名、泽名、泉名、池名、渠名、堰名、城名、关名、驿名、道路名、民族名、乡名、坊巷名等很多,并且书卷还重视对地名的诠释注解,反映了我国古代地名学的优秀传统,从而为历史地名研究,为钩沉稽佚史实提供了丰富的重要史料。

P.2065、P.5334载沙州各条干渠,皆注其名称来由。它们或以建造者姓名得名(孟授渠、阳开渠、阴安渠、都乡渠),或以渠道规模为号(三丈渠、大渠、长支渠),或以其位置、性能等特点称之(北府渠、宜秋渠)。据之不仅可以得见当时大规模渠系建造,绿洲开发的壮举,而且还了解到一些渠道早在前凉、西凉即已开凿,十六国时期敦煌的水利建设就颇兴盛。如孟授渠,即因西凉敦煌太守孟敏所开,“百姓蒙赖,因以为号”。

敦煌吐鲁番一带地当古丝绸之路大道,又是民族往来频繁、杂居的地区,这一特点在古地名中亦多有反映。如P.2005载,兴胡泊“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S.0367载,石城镇亦曰典合城,因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部落东来居之得名。从而将这一部族的迁徙状况清楚地显现了出来。黄盛璋指出,《使河西记》用于阾语拼写大量地名,特别是对时代早而又为当地民族命名的地名研究价值最大。如 $\text{argin'va}$ 来自 $\text{argi}$ ,当即汉代焉耆对音,中古化颞而为 $\text{arci}$  ( $\text{arsī}$ ),原文含有龙之意,而焉耆王皆姓龙;又如纳职城为鄯善人筑,胡人呼鄯善为纳职,因名其城,本卷拼写其名为 $\text{dapaci}$ ,与突厥语 $\text{Lapcūp}$ 、现代维吾尔语 $\text{Lapcūk}$ 互为印证,而 $\text{Lap}$ 又和罗布( $\text{Lop}$ )有联系,玄奘谓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而纳缚波为 $\text{Nap}$ ,即罗布,楼兰即鄯善,也证明鄯善与罗布有关,从而为纳职原音复原,及“N”变为“L”提供依据<sup>〔7〕</sup>。

### (九) 对于历史宗教地理研究的价值

S.0529记载某僧游历各地佛教寺院的情况,据之可知当时佛教较兴盛的地区有太原、五台山、庐山、峨嵋山、洛京、幽、定、镇、邢、邺、沧、扬、庐、光、洪、升、杭、潭、襄诸州。它们或为都城所在,或是节镇治所,或系经济都会,或属交通中心,均具有某方面或多方面的地理优势。如太原是唐陪都,李存勖灭后梁前一直为其统治中心。洪州为唐镇南节度使治所,商业都会,经济发达。潭州五代为楚的统治中心,地处洞庭湖盆地,系南北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五台山处中原腹地,又靠近北都太原,且环境幽雅,“乃菩萨修行之地,是神龙久住之乡”,自然成为中外僧侣信徒朝拜圣地,遂发展成当时我国最大的佛教中心之一。

除佛教外,敦煌遗书还保留有其他一些外来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火祆教等传入中土及其地域分布的记载,亦甚有意义,不赘。

#### (十) 对于古方志学研究的价值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五代时期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地志著作,包括图经、土境、地境、地志、录等,为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提供了极重要的实物资料。如P.2005、P.2009等,使我们一睹唐代图经的原貌,它们较以前所见的传世的最早的图经作品——北宋末年的《四朝图经》、《严州图经》等早了整整4个世纪。从清代乾嘉学派直到今天方志学界曾有一种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我国方志的定型和成熟是直到宋代才完成的,而图经则不属于方志之列;或曰“方志之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sup>1)</sup>;或曰“隋唐图经内容还不充实,体例也未定型,……,而不归入方志范畴”<sup>2)</sup>等等。这些研究者由于未看到唐代图经原件,无从了解图经原貌,因而所得结论均失之偏颇。笔者曾以P.2005为例,总结出唐代图经浩博翔实,规模宏大,地方特色突出,注重实用价值等若干重要特点;指出唐代图经囊括载记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的全貌,其目的在于资治,在于为封建社会行政管理服务,是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方志,在我国方志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较之早期的异物志、风土记、山川图记、州郡地记等在内容上、体例上、表现形式上是更为完善的地方志书。而两宋时期的图经等方志著作虽更有所发展,但其基本体例、格局还是承袭、仿援于唐代图经的<sup>[7]</sup>。

敦煌地理书卷体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笔者的探讨尚很粗浅,愿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1) (清)章学诚。《与戴东原论修志》,线装本。

2)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499页。



## 参 考 文 献

- 〔1〕 王重民. 敦煌古籍叙录. 商务印书馆, 1958, 106—135.
- 〔2〕 黄盛璋. 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1991, (1).
- 〔3〕 黄盛璋. 于闐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 敦煌学辑刊1996(10)(11).
- 〔4〕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中华书局, 1992. 339—343.
- 〔5〕 李并成. 唐代瓜州治所及其有关城址的调查与考证. 敦煌研究1990, (3).
- 〔6〕 李并成. 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 中国史研究1986, (1).
- 〔7〕 李并成. 唐代图经蠡测. 西北师院学报(增刊), 1986.

##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ANCIENT GEOGRAPHICAL BOOK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Li Bingcheng

(The Institute of Dunhuang-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ubject terms:**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Ancient geographical books

###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geographical books is preserved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ontents the 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3 parts: (1) the ancient local chronicles, including the local records of the whole country (3 volumes) and the local records of a part of the districts of northwest China (11 volumes); (2) the ancient travelling records, including the records towards Shiyuh (8 volumes), the records towards Wutai Mountain (5 volumes), and the record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1 volume); (3) the miscellaneous geographical books, including the books with regard to the water conservancy (2 volumes) and the books about the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al sites in Dunhuang (2 volumes).

These ancient geographical books are one part of the most precious book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Documents. They have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on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military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folkways geography, traffic geography, urban geography, agricultural geography, physical geography, religious geography, toponymy and local chronicles. They are the extremely valuable legacies of Chinese ancient geography.